

湘江头条

伍新福:

深潜苗疆撰史记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黄煌 通讯员 王晨羽

人物档案

伍新福,1935年出生。曾先后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和湘潭大学,历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,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、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、湖南省社科联委员以及湖南省历史学会、省苗学学会会长。主攻中国民族史和湖南地方史研究,特别是在中国苗族历史文化和湖南古代史、文化史领域,做了许多开拓性研究。先后撰写出版的学术专著有《苗族史》《苗族历史探考》《中国苗族通史》(上、下册及增修本)《苗族史研究》《苗族文化史》《论评与考辨》《湖南通史·古代卷》《湖南通鉴·古代》《湖南省民族志·苗族篇》《湖南民族关系史》《湖南文化史》等10多部。

伍新福。



罗洋山说是山,只算得上浅丘,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家属楼在高处。仲夏的早晨尚有凉风,我们踏着满地的樟影,往高处去。

著名苗族史专家伍新福在家中等我们。今年暮春,他出了新书《大湘西稽古录》,利用多年收集、发现的材料,首次将大湘西和古“五溪”地区作为整体,全面系统梳理和考察其历史文化发展。

这是一个朴素的三居室,家具和装潢都上了“年纪”,窗外勃发的绿意映进屋子。今年90岁的伍新福坐在沙发上,瘦长脸、莹白短发,声音洪亮、思路清晰。

他才从家乡湘西凤凰归来。这一趟去,有“出”有“入”——从事史学研究工作60余载,由他个人撰写和编纂、校点的著作,千万字以上,他向地方赠送了30部共44册史学著作。此行他又一次去寻访明代的苗族边墙,扶杖勉力登上山岗,依旧寻觅无果。但下坡时,却意外地得知了附近有个地方名为“边墙坡”。这真让他喜出望外:“明代的边墙是土筑的,不高,只有几尺高,日晒雨淋很容易消失,但是地名留下来了,说明这个地方曾经是有边墙的。”他爽朗地笑着,眼眸明亮,“新发现!”

从青年到暮年,他是真正的“学术长跑健将”,寻觅、记录、研究,他的学术早已与人生血肉相连。

从苗疆走来

每每经过凤凰沱江大桥,伍新福总会往南华山方向望。那里是父亲长眠之所,墓地已被葱茏的森林笼罩了。再打望一阵,他又隐约可以看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,忍不住感慨:“太变样了呀。”

1935年农历九月,伍新福出生在凤凰城郊的一个普通苗族家庭,父母给他取名“久福”。父亲少时“吃粮”当兵,后进城做面粉摊贩,母亲出身菜农之家。未满6岁,久福进入小学启蒙读书。读二年级时,母亲去世。得一位亲姑母,即同乡沈从文在《湘行散记》中记述的那位“同宗兄弟”、死于土匪乱刀之下的沈万林的遗孀,以及一位叔父等多方的帮衬,久福完成小学学业,升入凤凰县立中学。初二,因家境贫寒而转入免交“俸米”的县立乡村简易师范。每逢寒暑假,他还要入一位老秀才的私塾学四书五经,因此打下旧学的底子。

1948年秋,父亲心脏病发猝逝。13岁的孤儿久福只能辍学,得姑母介绍,当上了电话线路检修学徒。当时政局混乱、湘西土匪蜂起,他又辞工务农,开荒种地兼做脚挑运。

1951年,久福在城内收粪时,看到了新中国招考小学老师的公告,他决意报考。有感于新中国的成立和自己对于新生活的向往,改名“新福”。当年8月,他通过考试重回课堂,参加“短期师资培训班”,翌年被分配至鸦鶡营(今凤凰县阿拉镇)苗族地区担任小学教师。一年后,又经选拔入湘西第一民族师范(原省立九师)学习。1956年,伍新福以优异成绩毕业,考入湖南师范学院(今湖南师范大学)历史系,从此与史学结缘。

毕业后,伍新福在历史系助教,师从林增平教授,进修中国近代史;后又改修世界古代史,担任谢德风教授助手。1976年10月,伍新福调入湘潭大学。

“到了湘大后,我先与当时研究经济



吉首市矮寨大峡谷,苗族“四月八”祭祖仪式现场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

学的尹世杰、研究哲学的沧南等人合作,一起创办了政治系。后来政治系分成了经济、哲学、历史三个系,我负责筹办历史系。”他回忆,为筹建历史系,从引进师资,到设置课程,再到规划学科发展甚至课表安排,伍新福都是亲自过问、设计,并承担了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。

但他的兴趣一直在研究和写作上。“在湘大要教书,还要做系主任,这个系又是新办起来的,事务繁杂,分散了很多精力。我想摆脱这些行政事务的纷扰,有更多时间集中精力做学问。”5年后,伍新福离开了湘潭大学,调入湖南省社科院。“工作重心是做研究,非常适合我。”

将青山踏遍

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,大部分皆在交通、物产、经济活动情形下面,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缘,这一个地方,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。”近百年前,年轻的沈从文提起笔来,写下自己“古怪”的家乡。这“古怪”,和凤凰深处多民族地区有着密切关系。

“古怪”,也是伍新福隐隐的感受。小时候,周围苗族武装来攻打凤凰城,给伍新福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我也是苗族人,当时很多现象,我都不理解。”沈从文记载的那些“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”、“山岭蜿蜒各处的高耸碉堡,有森严、威慑的气息,令年幼的他心生畏惧。“我们苗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?它的起源、历史发展、苗汉关系是什么样的?我想着怎么把它弄清楚才好。”到省社科院后,伍新福决定以苗族历史为主攻方向。

数千年来,苗族先民不断迁徙,从北方到南方,从东部到西部,由平原到山区,由集中到分散,“筚路蓝缕,以处草莽”,没有自己的文字。做苗族史,要查阅大量汉文献,但相关记载也很有限,需要依靠大量的田野调查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伍新福跑遍了全国几个省的苗族地区。

这些地区大多地处偏远,当时的交通环境很不便利。一次,伍新福和妻子在贵州的乌蒙山区坐班车时,一辆拖拉机差点把他们的车撞下数百丈深的悬崖。在高山深谷中行村走寨,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,他常借住在村民家中,苗寨里的村民极热情。“他们没有什么吃的,养了鸡,就把鸡蛋都给我们拿过来煮了吃。”老人们唱起迁徙的古歌,讲述流传下来的故事,演示祭祀的仪式,伍新福一点点收集着口述资料、民族学资料、民俗学资料,捡起一块又一块“拼图”,逐渐把握整个苗族的状况。

“梳理分析综合了这些材料后,我也胸有成竹了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作出了一些科学结论,建立了一个系统和体系。”20世纪80年代中期,伍新福与贵州苗族学者龙伯亚合作,按通史体例撰写《苗族史》,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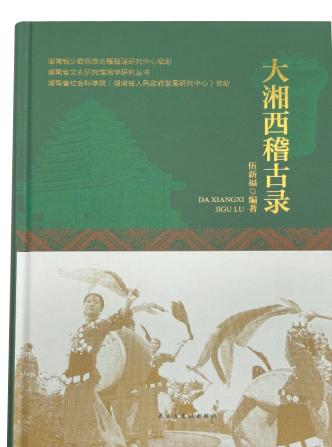
1999年2月,伍新福撰写的《中国苗族通史》(上、下册)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以苗族内部社会形态的发展嬗变为主线,系统、全面地论述和阐明了苗族自远古时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基本史实和发展特点。时间纵贯古今,地域横跨东西南北,包括全国所有的苗族分布区,苗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论述和阐明,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,渐渐有了轮廓。

近年来,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与出土文献的涌现,古代史成为热点。总有人好做惊人之语,甚至将苗族历史上推至旧石器时代。他反对一些人出于民族感情而将民族历史拉长、拔高,他坚持以实证著史,用史料互证等方式重构历史事实,再从理论的高度分析、研究,提出自己的观点、看法,他直言不讳:“那时哪有苗族呢?要有确凿的证据,必须实事求是,是什么程度就写到什么程度。”

入田野、坐书斋,伍新福似恍然不知“老之已至”。近十几年来,他主持和参与了《湖南通史》增订,参与了《湖南经济通史》和《湖湘文化通史》撰写,修订了《湖南民族关系史》,整理和校点了一批古籍,还编纂了260万字的《明实录南方民族研究史料》。

抚摸着新书《大湘西稽古录》的封皮,他说:“这是将我所有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所得贡献出来,为学科发展,为民族文化传承再作一点贡献。”说起学生、后辈们积极为他张罗的新书发布会,他很欣慰:“也给我学术生涯画个句号。”但提起一批尚未整理的古籍,他又觉得时间紧迫。近年来,考古学、人种志学、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与民族史学研究相结合,他很关注、很期待。

“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,古时苗人住在水乡边的地方;打从人间出现的魔鬼,苗人不得安居;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,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去……”摊开伍新福手绘的苗族迁徙地图,我们读起湘西苗族流传的古歌《部族变迁》,一种鸿蒙苍茫的气息飘荡开来,窗外草木摇动。这是先民传来的歌谣,文明的脉络不绝如缕,化为文字,落入史籍。“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弄清的事情。比如,民族的源流、苗族这样频繁迁徙的原因,都要进一步研究。”“要沉下心,走入田野”,他对后辈学人的殷殷嘱咐,一如他的目光,剔透,明亮。



《大湘西稽古录》书影。

湘江观潮

最近董宇辉直播时念起了横渠四句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被一位主播怒怼,挑起横渠四句大论争。因横渠四句出自张载《横渠语录》,千年之前的张载中枪。那位主播竟斥横渠四句“假大空”,说“大必然假,假必然空”。

我们这个时代,人们对世界本源的追问,似乎不多,对于宏大叙事,颇为厌烦。

但这是不公道的。张载年轻时爱读兵书,关心军事,曾经上书范仲淹。范仲淹对他说,儒者更有名教可乐,何事干兵?张载所乐之儒家大事,比军事更为重要,怎么谓之空?张载言出必行,表里如一,数十年如一日为理想而奋斗,颠沛必于是,造次必于是,怎么是假?可见,横渠四句,大是大了点,空、假未必。

人们对横渠四句往往有误读。中国古典哲学也研究世界的本源和始基,张载是气一元论的代表,朱熹是理一元论的代表,王阳明是心一元论的代表。张载的气一元论,意思是讲世界是物质的。理一元论的意思是,理在气先,世界是理念的是形式的。心一元论的意思是,心为本源,世界是意识的。古代人与现代人一样,都有思考终极问题的需要,都希望找一个本源作为基础,来奠定宇宙和社会秩序的基础,来承载安身立命的梦想,来回答“我是谁,我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”。张载的横渠四句,就是这种重要成果。

明末王夫之认为,横渠四句,是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理想的最高体现。“为天地立心”——这是寻找宇宙秩序。“为生民立命”——这是寻找道德秩序。“为往圣继绝学”——这是寻找文化秩序。“为万世开太平”——这是寻找政治秩序。

张载生活的时代,正值孔孟道绝,佛老横行,异端邪说流行,人们找不到方向,看不清前路,得不到帮助,处在虚无主义(没有未来)、相对主义(没有好坏对错)、怀疑主义(没有信仰)、神秘主义(没有理性)的各种悖谬中。张载以气一元论为核心的横渠四句,如丽日经天,驱散迷雾,指明方向,带来温暖和希望,功莫大焉。

在网络大战横渠四句之时,我正在翻看几本消夏之书。冥冥之中似有天意,这几本书的内容,有意无意地与争论的问题隔空相应答:

查理·芒格的学生、知名投资人李录所写的《文明、现代化、价值投资与中国》,就是以商人身份思考“中国从哪里来,中国往哪里去”这样无比宏大的问题。他认为,中西两块大陆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各自演化,逐步形成政治贤能制与经济贤能制。而经济贤能制又以市场经济、宪政民主与科技文明为内容,建造了一个可以吸纳其他市场的大市场,并推向全球,代表了现代化的方向。李录认为,当中国真正地达到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结合,并且在国内外有较为和平的大环境下,现代化在中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发生。在书中,李录把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人查理·芒格比为士大夫。他认为芒格靠知识创造财富,实现福德一致,其本质是一个道德哲学家,是一个学者。

有人说,董宇辉也配说横渠四句,也不看看有没有资格。我想说,士大夫并非政治的特供,也有经济士大夫。何况,人人皆可成圣贤,读书学习说横渠四句还要审查资格吗?

罗翔老师推荐的古希腊柏拉图的《卡尔弥德篇》很给人启示。书中苏格拉底与格里底亚认为,明智是找到一种关于知识的知识,也就是全知知识、无限知识。苏格拉底认为,对于全知知识的追求,是人类的狂妄,真正的明智是对自己的无知保持足够的开放。苏格拉底对全知知识的提醒,在AI时代来临的今天,仍然值得我们警觉。一方面,要警惕知识的碎片化,另一方面,也要警惕知识的绝对化。

在追求大道的过程中,我们也应对主体性谬误保持警惕。所谓主体性谬误,就是将“我”的视角直接等同于“我们的”共识,将个体价值强加为全体准则。

有终极思考、追求自我实现的我们,已经有了主体性准则的免疫能力,已经明白不能把我们认为正当的秩序强加于宇宙社会,也不能理所当然剥夺他人寻找宇宙社会秩序的权利,更不能先验地甩出既定秩序蓝图,强迫他人执行,而只能在平等交往中,总结出各个相关主体都可接受的秩序。

我们当然相信

天地有其心,生民有

其命,但我们也不得

不争论,何者为天地

之心,什么是生民之

命。主体性准则不需

要争论,秩序共识建

立之前,必有相关的

争论。横渠四句的争

论,也许可以有利于

形成共识。我以为,

这种经过争论后形

成的共识、准则、秩

序,才是真正的天地

之心,生民之命。



张载塑像。 通讯员 摄

尹亿民

横渠四句,「假大空」了吗?